

舟楫万里：宋代海上槟榔贸易

鲁仕浩 岑江明

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博物馆内，一方“清代槟榔铜食盒”静默伫立。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泉州湾古船陈列馆中，两枚宋代槟榔实物遗存，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份沉默的证言。这两件跨越时空的文物，共同勾连起槟榔在宋代完成的华丽“身份跃迁”——从一种区域性的嗜好品，通过日益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蜕变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大宗贸易商品与重要的文化媒介。

文物为证：从海南食盒到泉州沉船

槟榔源自热带雨林，在海南黎族的传统生活中，槟榔盒、槟榔灰盒、槟榔叶筐等器具构成了完整的嚼食体系。槟榔不仅是日常待客的佳品，更是订婚仪式中的核心礼物。乐东博物馆的清代铜食盒，正是这一深厚民俗的物质结晶。

在宋代海上贸易的核心港口之一——泉州，出土古船中发现的槟榔实物，则将我们的视野引向更广阔的海域。这些与沉香、胡椒、玳瑁一同沉睡海底的货物，无声而有力地证明了槟榔曾是当时商船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标配”大宗商品之一。一南一北两处文物，共同指向一个清晰的历史图景：至迟在宋代，槟榔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原产地东南亚及海南等地，系统地输入中国东南沿海。

舟楫往来：宋代槟榔贸易的盛况

宋代是槟榔贸易的黄金时代。其种植与贸易版图在当时已相当清晰。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槟榔》载：“槟榔，产诸番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这里的“诸番国”涵盖了占城（今越南南部）、阇婆（今印尼爪哇）、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等主要产区。《诸蕃志·槟榔》明确指出：“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鸡心、大腹子多出麻逸。”《诸蕃志·海南》中提及“海南土产……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这表明海南槟榔不仅品质优良，更是泉州商人重要的贸易支柱。

当时的贸易流向呈现出灵活的多层次结构：一方面，南洋各国的槟榔直航广州、泉州等大港；另一方面，海南所产的槟榔也由商贩之手，跨海分销至闽、广、浙等地。甚至海南槟榔还反向输出至交趾、扶南，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槟榔》记载：“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形成了双向流动的区域贸易格局。

槟榔贸易的规模之大，从其贡献的税收可见一斑。《诸蕃志·槟榔》载：“商舶兴贩，泉、广赋岁少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数万缗”在宋代是一笔巨款，足以说明槟榔在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市舶司收入中占据着可观的权重。据宋人王灼《糖霜谱》载诸如沉香、槟榔等热带亚热带特产“四方不产出，乃贵重于世”。文献中“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的描述或有夸张，但槟榔作为海上贸易“硬通货”之一的地位确凿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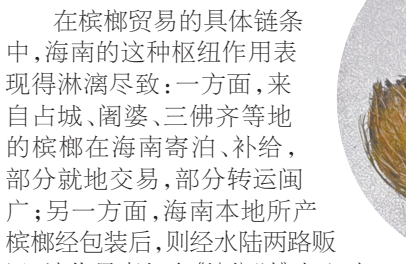
枢纽与辐射：海南在槟榔贸易中的双重角色

槟榔贸易的繁荣，深刻依托于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而海南岛在其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双重角色：它既是重要的产地，更是关键的贸易枢纽。

地理上，海南扼守南海航道咽喉，正如宋人楼钥所说，往来的海船“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往集番禺东”，海南是商船从南洋驶向中国大陆的必经之地和中转枢纽。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广州市舶司专门奏请在琼州设市舶机构，负责从南洋返回船舶的检查，防止商船偷漏税，足见当时经过海南的贸易流量之巨。



博物馆藏黎家槟榔盒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藏槟榔

在槟榔贸易的具体链条中，海南的这种枢纽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来自占城、阇婆、三佛齐等地的槟榔在海南寄泊、补给，部分就地交易，部分转运闽广；另一方面，海南本地所产槟榔经包装后，则经水陆两路贩运。清代吴若仁在《槟榔赋》中生动描绘了这种景象：海路则“或鸥浮巨海，数日直抵江门”，陆路则“或足捷长途，经旬乃至梅萼”，被销往中国东南各省及南洋各地。这种“生产—集散—消费”的立体网络，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活力的缩影。

槟榔贸易也深度影响了海南本土的经济发展。槟榔作为输出大宗，其贸易利润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同时，贸易也带动了从采摘、加工、包装到运输、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槟榔》中记载，宋代士大夫常随身携带设计精巧的槟榔盒，其形制如银，内部分为三格，一盛萎叶，一盛石灰，一盛槟榔。这类专用器物的普及，反映了围绕槟榔消费的社会分工已相当精细化。

槟榔的东传，远不止是物质的流动，更是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嚼食槟榔并以之待客、婚聘的习俗，在东南亚社会源远流长。《诸蕃志·渤泥国》记载，渤泥国（今文莱一带）婚俗“婚聘先以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诸蕃志·占城国》中记载，占城国王出行，更有侍女捧槟榔随行的仪仗。纵观历史，槟榔在中国的文化意涵不断演变。从两汉三国《异物志》中猎奇的“奇草异木”，到南北朝时期贵族阶层的“奢侈品”，再到唐宋时期，受商业流通和佛教平等观念影响，逐渐成为百姓家的“寻常物”。其最终能深度融入华南社会礼仪，是因为它被赋予了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内涵——从待客之礼到婚聘之信，再到文人所比拟的“君子品格”，槟榔完成了从热带果实到文化符号的蜕变。结语从海南黎家的槟榔铜盒，到泉州湾沉船中的果实遗存；从南洋诸国的婚聘之礼，到宋代岭南的待客新风。一枚小小的槟榔，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巨浪中远航，串联起生产、贸易、消费的完整链条，也见证了物质交换与文明互鉴的深刻历程。海南作为产地与枢纽，泉州作为消费与始发港，无数穿梭其间的舟楫，共同编织了一张繁荣的贸易网络。槟榔贸易的兴盛，是海上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微观缩影，它凸显了经济中心南移后，广州、泉州、明州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的国际大港，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参与海洋贸易体系的历史事实。当我们凝视这些古老的器物与记载，那段借由槟榔所展现的、跨越海域的文化交流史，便如此生动地浮现于眼前。槟榔虽小，却承载着区域交流的历史记忆；槟榔盒虽微，却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流沙瀚海，丝绸之路是商贸往来之路，更是一条横跨万里、纵贯千年的科学技术传播之路，每一项技术背后都承载着无数工匠与发明家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智慧接力，彰显着不同文明在碰撞中取得的理解、尊重与进步。

2026年5月出版的《古道春风：丝绸之路上的技术传播》作为“丝路文物科普丛书”的第二册，是聚焦丝绸之路之上东、西方科学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学术普及类读物。它像一阵清新的风，吹拂过被无数次书写却依然魅力不减的丝绸之路，新一代学人用自己的方式，与古老的丝路对话，将相关文物、考古、历史、科学知识转化为公众可及的阅读体验。书中收录十八篇专题文章，分“文明的原点”“春风度玉门”“化为绕指柔”“大海在那儿”四个篇章，结合考古发现、科技成果、历史文献等，图版类型丰富，叙述严肃活泼，帮助读者了解丝绸之路上源远流长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了解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并透过技术认识文明，透过文明观照自身。纺织、种植、造纸、印刷、玻璃制造、青铜冶铸、战车与船舶、地理与天文……十八种技术，十八扇通往不同时空的门，推开任何一扇，都能看见另一个世界。

有关技术的故事很古老，讲故事的人却很年轻。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文博专业的青年学子，敏锐捕捉到文物背后被忽略的细节，把在课堂上、博物馆里、书本中学习时的所思所感，精心集结成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同时对于编辑来说，也造成行文时有枝蔓，逻辑偶见跳跃……我想其不应该被打磨成标准件，而是要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因此努力去掉了杂糅的枝蔓，保留了那些忍不住的惊叹，那些真诚的比喻，正如“有关酒神的瑰丽神话从未远去，千千万万在酿酒技术更新与发展历程中付出巧思和实践的劳动人民，就是真正的酒神”，又如“若要知水何长，先寻其径；若要知山何高，往巍峨峰行。细瞧人间，满目皆是大好河山，怎能不仔细探看？”这正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

全身心投入编校，也能更好地深入到内容中去。

一件件具体的文物，是本书的经纬。从一碗四千年前的面条，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镜；从一件异域风格的银器，到一张泛黄的文书……每一件器物都不是孤立的审美对象，其从何而来、由何技成、经何人之手又流向何方？以物系事，以物牵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织着一则汉代星占辞，封存了古人对天象、战争、国运的理解，见证了西域与中原之间远不止于物质的深度联结；辽宁冯素弗墓出土的木质包铜双马镫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小小一对马镫，推动着历史的转向，从慕容鲜卑的骑兵，到高句丽、突厥、阿瓦尔人、中世纪欧洲，间接塑造了封建欧洲的社会结构；还有苏美尔泥板上重叠的半圆形山岭，古巴比伦圆盘状的世界图景，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经纬投影，放马滩战国木板地图上精准的墨线关隘，每个文明都以地图作对“空间”的主动宣告，它们的技术逻辑各自独立，却在丝路上悄然交汇、彼此滋养。文末精心设计的“技术断章”板块，是即时的知识拓展包，补充“陵阳公样”“喇家遗址”“苏颂法”等，可适配更深度的阅读。

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共筑了本书的底色。作者们来自文史专业，却不回避技术问题之艰涩；造纸的工序是怎样的？炼钢的技术如何迭代？青铜的合金配比背后

《古道春风》——丝绸之路上的技术传播》编后

朱婷



“五星出东方”的织女，卡斯蒂尔火炮火中倒下的骑士……技术之源，永远是具体而微的欲望、恐惧、希望与勇敢。一粒稻米与一颗小麦的迁徙，引出“究竟是人类驯化了农作物，还是农作物驯化了人类？”的哲学之问；火药的诞生于方士的长生迷梦，最终成为摧毁中世纪城堡、瓦解骑士阶层、助推资本主义崛起的毁灭性力量，每一项技术的传播，都伴随着权力的重组、阶级的兴衰、世界秩序的颠覆与重建。“钢筋铁骨的枪炮里不仅能射出弹药，也能开出芬芳的玫瑰；最剧烈的爆炸，其回响终将归于对生命的悲悯。”此般对技术史的关注，可谓真挚。

写书做书的人，常常期待“理想读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熟悉学术话语，能读懂各种隐喻与典故。可真正的读者，恰是那些站在书架前，犹豫着“能不能看懂”的普通人。落地生根的科普，并非把知识翻译成低配版，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教会”，而是从无垠的知识海里，打捞出让最动人瞬间，邀请你并肩同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公众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对相关科普读物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然而，当下进入公众视野的丝绸之路科普读物，整体仍处于较为初级阶段，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未臻成熟。《古道春风》及《丝路文物科普丛书》编写，正是看到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都有被科普的诉求与可能，并基于此做出的尝试。它绝非浅白说教，也回避屈膝咬牙、行文流畅，逻辑清晰，每一篇文章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技术史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曾试想，读过这本书，再走进博物馆，会看到什么？或许我们对展板中那些专业术语仍迷茫，但一定能感受到“树在高山，螺蛳深海，在八千年的漫长时光中，邂逅相融，共同演奏着树与海的交响诗”，不会觉得，那件文物只是玻璃柜里一个与己无关的精美物件。科普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家，但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与文明产生独属个人的情感联结。

小麦从西亚来，面条往西方去，面条在丝路上也来回走了上千年。文明和文明之间，其实也没那么远。缘起一面中，舞罢春风里。

付梓之际，也生发出对“丝路文物科普丛书”第三辑的期待。确实被一本书牵着，走到了比预期更远的地方。或许那些熬着夜写稿的年轻作者，在库房里找图的编辑，和一千年前在作坊里打磨螺钿的工匠，隔着时间，做着同一件事——分享美好。技术也好，器物也好，文明也好，最终指向的是人、人的好奇、人的勇气、人的相逢。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馆藏“黑石号”出水长沙窑水盂初探

杨莉娟



“黑石号”出水长沙窑青釉褐绿彩水盂

1998年印尼勿里洞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出水了大量中国陶瓷器，其中以长沙窑瓷器为大宗，共56500多件。这些长沙窑瓷器中，碗的数目最多，约5万件，其次是壶类，其他还有罐、盘、瓶、水盂、油灯、熏炉、油盒、碟、盘、瓷塑等各种类型的产品。2017年，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成功从海外征集到一批黑石号沉船长沙窑瓷器，共162件（套），其中包括长沙窑水盂13件，这组水盂造型小巧精致、规格相近，应为统一烧制，专供外销的器物。本文拟对这13件水盂的形制特征、传统功用及外销后的功能转变进行初步探讨。

形制特征

馆藏13件黑石号沉船长沙窑水盂，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敛口，扁鼓腹，饼足底，最大径在腹部，内口沿和外腹上部着白色化妆土，肩部靠近口沿处等距离绘三个褐绿彩草叶纹，以追求平衡对称美。彩绘面积较小，可能与器型本身面积较小有关，主要起点缀作用，以增加器物的观赏性和审美性。口径皆为2.5厘米，腹径在6.5厘米至7.1厘米之间，底径在3.3厘米至3.5厘米之间，高度最低3.7厘米，最高4.5厘米。

水盂的传统功用

水盂又称水丞、水盛，是研磨时用的储水器物，多为小型器，是“文房四宝”之外的辅助性文房用具，又称“文房第五宝”，与水注、水洗并称“书案三珍”，格外受文人雅士喜爱。由于往砚池倒水时要控制水流大小，口部较小，使用时多配以小匙，以便掌控水量。

《说文解字》曰：“盂，饮器也”，可见盂最初是用作盛放饮品的存储器。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水盂辨·晋人水盂》：“余尝见长沙故官家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一合，号右军砚水盂，其底内永和有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砚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明确指出了水盂的作用是储存研磨用水。

水盂材质在汉代多为石制、玉制，后来由于瓷文具有在使用中不渗不漏、耐腐蚀、易洗涤以及价廉等特点，使它更加普及，逐渐成为制作文具的主要材料，唐宋时期瓷质水盂成为主流。

陈毓文《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说，唐宋两朝是中国文化发展转型的时代，文人的心态也随之变化，趋向内省精致。随着陶瓷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

和社会需求的日益扩大，水盂的制作愈发讲究，成为文人雅士所钟爱的文玩物件，体现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寄托他们的情感。

水盂外销西亚等地后功能转变可能性探讨

“黑石号”装载的长沙窑、越窑瓷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苏丹的阿伊扎布遗址，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伊朗的尼沙布尔遗址和希拉夫遗址等地均有发现。柏林佩加蒙博物馆陈列室藏有在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的、与“黑石号”一样的白地绿彩瓷器和白瓷，而在欧洲至今尚未有类似发现。因此，学界普遍认为“黑石号”的最终目的港应该是阿拉伯帝国的某个港口。

中国瓷器外销后，其功能与文化内涵常因接受地的文化习惯而发生转变。王光尧先生指出，海外各地区所使用的中国瓷器，除日用器的性质外，其功用和文化内涵亦有转变。综合相关研究，这种功能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用作生活用具，被视为装饰品、用作葬具、宗教用品、作为财富的象征进行收藏，作为贸易媒介甚至充当货币功能。其中，主要功能还是作为某种生活用具。

在我国主要作为文房用具的长沙窑水盂，到了阿拉伯国家以后，在功能上很有可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生改变。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亚、印度西北、北非以及几乎整个比利牛斯半岛。这些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步伊斯

兰化，因为阿拉伯文字是记录《古兰经》的唯一文字，所以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这些民族纷纷采用了阿拉伯文字。阿拉伯文字主要是用空心的芦苇制成的笔来书写，通过小刀切割芦苇的一端，形成不同角度的斜角，达成不同的书写效果。墨水填充在芦苇的细管内，书写时多用黑色、棕色等深色墨水，红黄白蓝金银等色偶尔也会见到，多为辅助装饰，墨汁多用调色板调，很少会用到砚台。如在古埃及，从事文书工作的书吏使用的书写工具是调色板、水罐和插有芦苇笔的笔筒。这3种工具通过细绳串联在一起，每位书吏都随身携带，背在肩上。从以上可以看出，西亚、北非等伊斯兰国家，文房用具非常简单，与中国的文房用具相差很大。这大大降低了对水盂类储水容器的文房需求。故此推断，水盂到了西亚北非这些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使用功能很有可能发生改变。

关于水盂销往西亚、南亚等地的具体用途，有学者推测这类小巧的容器可能被重新赋值为盛放贵重物品的容器，尤其是香料或香水。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建毛曾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过相关考察，在调查中发现，有使用类似水盂的小型容器盛放香料的习俗。尽管该现象属于当代观察，但其可能蕴含着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为理解唐代外销水盂的功能转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器型演变的视角来看，宋元时期福建地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等以外销为主的窑口都生产了大量的小罐类器物，这些小罐器物与唐代长沙窑小水盂大小差不多，施釉工艺也相同，只是在形制上略有变化，如有的有双耳、有的器身施不同的纹饰等，应是由唐代水盂器型演变而来的罐形器物。汤亦斐《刍议元代龙泉窑外销产品中的小罐类器物》一文认为，《南海古陶瓷》中收录的无系小罐往往与香盒相伴出土，元代龙泉窑花卉类题材的小罐与装香料的功用更为契合。同样，对同类型的青花双系小罐，亦有学者认为“双系既可以方便携带，也可系盖，盖子在运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极易缺失所以有部分应该是配以木质或金属材质的盖子，应该是东南亚人用来存放药物和香料”。这一现象或许暗示，从唐代水盂到宋元小罐，存在着一条以外销为导向，功能上偏向香料容器的演变脉络。

就已知情况并结合上述资料，可以推测长沙窑水盂外销西亚等地后，在使用功能上极大可能发生了改变，成为主要用于装香料、香水等的生活用品。

（作者单位：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

■ 广告

MicroWise System
文化遗全链数智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智慧消杀服务、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572270596（张总） 座机：029-88246388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E座4F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智慧物流，科技赋能
为文物运输保驾护航**

**智慧点交，智慧包装
智慧运输，智慧仓储，服务全球**

范国轮
电话：13522203335
邮箱：fgl@bjkingkerry.com
网址：www.bjkingkerry.com

北京金开宇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五至八版责编：崔波 王龙霄 甘婷婷